

也谈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 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

——与孙武霞同志商榷

韩 钢

孙武霞同志在《瞿秋白在第三国际活动纪略》（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以下简称《纪略》）中认为：共产国际“六大”期间，瞿秋白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一理论“站不住脚”，“不能成立”，并正确阐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澄清”了共产国际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人的模糊认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我认为，共产国际“六大”期间，瞿秋白对“第三时期”理论是基本赞成的。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但又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并没有澄清党内的模糊认识。

从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的发言看，他接受了“第三时期”理论。众所周知，“第三时期”理论的中心点在于强调帝国主义矛盾空前尖锐，从而导致世界大战危机和反苏战争危机及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危机。瞿秋白在发言中完全赞同共产国际的分析，他明确地肯定：“现在总的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稳定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我们面临着战争危机、反苏战争的危机以及干涉中国革命的危机。”因此，“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就是“所谓第三时期的特点。”（《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页）他甚至还说这种形势“必将导致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远比1914—1918年战争更为可怕的战争”，那时“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反苏战争、反对中国革命和反对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战争可能交织在一起”，因而要求共产国际各支部“严肃而系统地准备应付”那“一旦爆发太平洋战或中国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国际的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进攻中国工农”的战争。（同上第412页）显然，瞿秋白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共产国际不存在根本分歧。

不错，瞿秋白确曾说过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区别甚微”，《纪略》一文正是以此作为瞿秋白否定“第三时期”理论的根据。其实，瞿秋白只是批评共产国际提纲在农业、殖民地和

带有反动色彩，终于发生了重大转折。而执美国外交车轮的新总统杜鲁门，在垄断资本家的授命下，完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推行美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反动政策。

正是从上述全部分析中，我们认为，美国对华政策重大转折是大战胜利前后国际间政治、经济、外交诸因素总和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美国利益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在抗战胜利前夕的国际政治格局里，没有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沿着合作道路走下去”的可能，也不可能出现中国重演英国和南斯拉夫关系的那一幕。

太平洋问题上没有得出“明确答案”，使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区别甚微”，因此，他提出：“提纲中还是应该提出第三时期”，但是对上述问题“应当有比较明确的阐述”。（同上第379页）可见，瞿秋白并无否定“第三时期”理论之意，倒有补充这一理论“空白”之心。大会期间，当布哈林指责瞿秋白否认“第三时期”与“第二时期”有区别时，瞿秋白明确申辩自己“根本没有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之间没有区别”。他之所以建议对某些问题作“更清楚、更明确地分析”，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强调指出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同上第411页）

共产国际“六大”之后，瞿秋白亦未改初衷。他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写下《战争暴动革命之时代》，全面阐述了“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世界形势正处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3期）

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六大”已经作了肯定的。“六大”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一度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无间断革命”论，统一了全党思想。就这一点说，党内的模糊认识并不是瞿秋白澄清的。但是，“六大”对革命性质问题的解决是不彻底的，因为它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了民主革命的敌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中国革命只有反对资产阶级才能成功，这样，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对象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造成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和党内思想混乱，又为以后的“左”倾错误伏下了根子。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不是“澄清”而是继续了“六大”的缺点。他在承认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阶级，完全投降了反革命阵营”，因此，“革命斗争的矛头不仅是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要指向中国资产阶级。”（《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81页）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无疑是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可见，瞿秋白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中，本身就包含错误的成分。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瞿秋白还缺乏澄清共产国际和中国党内模糊认识的成熟条件。

首先，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机关，给予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以许多正确指导，但也逐渐形成了专断作风，不顾各国特点搞“遥控指挥”。按照共产国际定下的基调，“六大”要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必须“去与乡村中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斗争，以求前途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共产国际这些过左的理论和政策，都是党通过决议的形式接受下来的。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的崇高威望，党内许多人迷信，又还不懂得把马列主义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以，许多人的模糊认识要得到澄清，是难以做到的。

瞿秋白同志本人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有正确认识，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大革命后期，他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但又以为中国“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他受所谓“不断革命”论影响较大。“六大”之后他对这一错误理论有了纠正，然而认识的彻底转变不是立刻完成的，他思想上也还有模糊之处，在这种状况下，瞿秋白同志还达不到澄清共产国际和中国党内许多人模糊认识的思想水平。

共产国际“六大”上，瞿秋白同志批判了中国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还保持着占优势的封建剥削方式残余，肯定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说他的认识对党内同志毫无影响。但是这些都是有限的，并未达到《纪略》一文所述程度。